



“十七年”文学生产研究的“向内转”

——以“古典文学”为视角的文学内部研究

唐 蕾

【内容摘要】 关于“十七年”文学生产，以往研究过多集中在物质性的外部研究且日趋同质化。因此，回归文学本位，研究“向内转”已成当务之急。而选取以往较为忽视的“古典文学”视角，可以在文学谱系内部寻找突破点，由此展现古典文学资源进入当代文学创作与价值生产的动态过程，发掘其在文学生产各环节的建构作用。同时，以古典文学资源为中间物，可考察其在文学场域内与其他文学资源间复杂的渗透、博弈关系。

【关键词】 文学生产 古典文学 文学资源 史科学

【作者】 唐蕾，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南京 210023）

① 童庆炳：《马克思早期的艺术生产论的现代意义》，《中国文学研究》1997年第4期。
② 洪子诚：《当代文学的“一体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0年第3期。

“艺术生产”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特有概念，既包含艺术生产的主体与客体，又包含了艺术生产的目的、手段、产品，产品的价值、消费，更为重要的是它所表达的是过程，即生动的艺术生产的全过程、动的过程。^①“艺术生产”理论经由本雅明、阿尔都塞、伊格尔顿、詹姆逊等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发展，形成了“文学生产”理论，并在国内引起较大反响。学界逐渐认识到文学的意义不仅在审美之维，而且在于可通过对文学生产、传播、消费过程的研究来重构当代文学版图。在福柯的“权力话语”、布尔迪厄的“文学场”、鲍德里亚的“文学消费”等理论启发下，学者们将权力运作与话语生产结合起来，试图从物质性的外部研究去揭示文学的权力关系及其运作机制。

洪子诚率先开启了1950—1970年代“文学体制与文学生产”的“一体化”研究，并指出“一体化”格局的形成是一个持续的、充满复杂斗争的过程，各种文学派别和力量互相渗透，又激烈冲突，构成了紧张的关系，而各种文学力量、派别的位置，也不断发生调整和转移。^②“十七年”文学生产机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文学生产者及其组织、团体的考察，对文学创作、出版的生产过程，文学评价机构及文学作品消费模式的研究等。如张均与王本朝的同名著作《中国当代文学



微信公众号

制度研究(1949—1976)》对文学生产的制度性研究,王秀涛、李洁非、杨劼、黄发有、斯炎伟、吴俊、郭占涛、武新军等人在文学传播、文艺政策、稿酬制度、文学会议、新中国文艺报刊等方面进行的深入研究,此外还有大量相关硕博论文。

自1990年代以来,“文学生产机制”研究热度一直居高不下,但近年来渐显颓势,研究同质化倾向明显。对此,学界也发出了反思的声音,指出当下的研究过于强调文学中一切可视的物质性标记,而疏于关注作家的精神标记,习惯化命题比比皆是。^①当下的批评史、思潮史研究侧重理论多,联系语境与机制少,对批评主体的孤立研究多,整体的关联性研究少;制度史研究则对文学制度的构成性、功能性关注多,而对制度的多样性、差异性及其制度背后的人事与人情纠缠分析少,对影响机制运作的政治性因素关注多,而联系其他语境少。^②面对此种现象,笔者提出当代文学生产研究应“向内转”,回归文学本位,在文学谱系内部寻找突破点。以“十七年”文学为例,选取以往相对被我们所忽视的“古典文学”视角,展现其在文学作品与价值生产过程中的建构作用;考察其在文学场域内与其他文学资源间复杂的渗透、博弈关系——这种文学内部视角的引入,或许能让我们获得一种珍贵的距离感,历史现场也将以别样的方式得以呈现。

以古典文学为视角,对文学生产各环节的再考察

“十七年”时期,对“古典文学”的阐释具有非常明显的“当代性”。古代“经典”在当代的重新确立,本身就是与旧的评价标准、价值判断不断协商的过程。作为被遴选的“文化遗产”,古典文学以淡化其文学性与古典性的方式参与到当代文学建设中来。一方面,利用“古典”的象征、隐喻特性,古典文学常被作为政治符码,出现在一些特殊的历史时刻。毛泽东便多次通过对古典文学的阐发、注释,传达政治意图。1958年南宁会议期间,毛泽东多次提及《离骚》,在信件中表示“我今晚又读了一遍《离骚》,有所领会,心中喜悦”,并且批示印发《离骚》给与会者。1959年8月,毛泽东在庐山会议期间写作《关于枚乘〈七发〉》一文,分发给与会者传阅,这篇一般干部难以读懂的大赋,“其用意自与庐山会议后期的主题有关”。^③1960年代初期,为了配合反对苏联修正主义,战胜自然灾害,毛泽东指示出版《不怕鬼的故事》,从编目到序言都亲自过问,对这些古典文学作品的解读显然不在其文学意义。另一方面,作为历史的遗形物,这一时期的古典文学研究努力涤除其历史特性,强调与当代结合。为了摆脱早期的边缘地位,古典文学学科在“十七年”时期努力向当代文学趋近,这一点在文学史叙述中就有所体现。为了加强古典与当代的关联,陆侃如、冯沅君在《中国文学史简编》的“结语”部分增设了“今后的展望”一节,内容从五四运动一直延续到两次文代会的召开。从历史的阶段来看,古典文学是现代文学的源头,但在当时的文学史写作中,当代文学对古典文学却形成了一种逆向哺育的关系。^④

发掘当代文艺创作对传统艺术的继承与发展,是古典文学资源进入当代文学研究最成常态的方式方法。通常来说,当代文学评论家是这类研究的主力军,但是“十七年”时期,这类研究却更多由古典文学学者承担。李长之、任继愈、王瑶、刘大杰、孙昌熙、赵侃、吴文治等人都曾对鲁迅与古典文学遗产关系进行研究;冯沅君对《三家巷》《苦斗》中的人物形象与古典小说、戏曲人物形象进行过对比研究;李希凡对革命英雄传奇小说与古典章回小说做过关联研究;吴小如曾指出《儒林外史》乃是“真人真事”写作方法的源头;何满子则将《儒林外史》视为知识分子小说写作道路的开启。此外,《鱼鹰来归》《铁笔御史》《锻炼锻炼》《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烈

① 李海英:《当代文学制度研究的问题与悖论》,《扬子江评论》2017年第5期。

② 杜国景:《当代中国文学批评语境与机制研究》,《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

③ 陈晋:《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下),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197页。

④ 唐蕾:《从“十七年”文学“分期”讨论看“现代文学”的构造》,《文学评论》2018年第4期。



火金刚》《红旗谱》《山乡巨变》等小说都曾被放在古典小说传统的命题下进行过相关研究。

而现代作家在此一时期身份的“古典”转向,更是“十七年”文学中独有的风貌。1949年后,不少现代作家身份转变,自觉或不自觉地向古典文学研究。如废名在吉林大学开设杜诗研究课程,其间配合学术热点,进行了《诗经》《水浒传》的研究。张天翼在1949年后也承担了一些古典文学研究工作,他曾是中国作家协会《红楼梦》研究小组的召集人。王统照任山东省文联主席时,曾发起组织蒲松龄研究小组,个人也发表了相关论作。聂绀弩1951年由香港返回内地后,出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兼古典部主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兼古典文学研究部副部长,不仅主持并组织《水浒传》《红楼梦》等古典文学名著的校订、注释工作,自己也撰写了部分论文,1960年代,他将精力放在了旧体诗写作与《聊斋志异》《红楼梦》等古典小说研究上。可以说,身份上的“古典”转向,加上现实题材写作的受限,直接催生了现代作家创作上的变化。

因此,古典文学资源在“十七年”时期的被遴选、吸收、转化便具有了不同以往的风貌,贯穿于文学生产的各个环节:

第一,从文学生产者层面来看,不少现代作家自发或自觉地“化古”的倾向值得关注。1949年后,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无论在身份上还是心态上都出现了“古典”转向。1958年,陈翔鹤作为《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的主编,针对高校本文学史将陶渊明划为“反现实主义诗人”的现象,发起了“陶渊明讨论”,随后创作《陶渊明写〈挽歌〉》一文,为陶渊明“翻案”。陈翔鹤的创作开启了此一时期“古代文人小说”的创作,在“陶渊明”的示范作用下,越来越多的现代作家,在文本中与古代文人跨时空对话,发皇心曲。以此一时期“杜甫”小说创作为例,不少小说作者本身就是杜甫研究专家,如《白发生黑丝》的作者冯至于1952年出版了《杜甫传》,这是新中国第一部杜甫研究专著;写作《草堂春秋》的姚雪垠在抗战后期就有写作《杜甫传》的计划,1949年前已经写了几章;《曲江踏青》的作者陈贻楹1950年代曾两次写过杜甫传记。至于写作《杜子美还家》的黄秋耘,早期“干预生活”的忧愤急切的情绪在1958年后被舒缓平稳的抒情所取代,1962年出版的论著《古今集》呈现出以“古典”为对象的写作特点。^①

这些作家大致属于“后五四”一代,有较好的古典文学修养,能够在身份转换后,比较自如地转向古典文学研究,再将研究转化为创作。针对这种现象,通过对作家的创作动机与艺术追求的考察,在其纪实性的研究与虚构性的创作间进行互文解读,深入主体精神内面,可以展现出知识分子充满张力的心理状态,从而有可能对文学生产者身份特征做出新的解释。同样是“古典”转向,不同作家的动机却不尽相同,有些是以追求个体心灵自适为主,另一些则是身份驱动为主,需要具体作家具体分析。这也是针对以往在“身份”研究中过多强调外部的制度性揭示,忽视主体心理状态而做出的调整。文学研究应与人的灵魂揭示相关,“真正可以和作家主体的心态沟通,看到作家主体在所有这些方面所呈现的精神活动的真相”。^②

第二,在重新审视文学生产者的身份特征后,自然就转向对此一时期“古典化”文本生产的考察。围绕学术热点,不少研究成果被转化为艺术创作。“十七年”时期,“世界文化名人”纪念活动在学界产生的影响力不容小觑,与其背后的“世界和平理事会”关系巨大,它是冷战时期由苏联牵头的统战组织。通过文化名人的推选与宣传活动,中国获得了更多在世界发声的机会,起到了宣传民族文化、提高国家声望的作用。当选的历史文化名人——关汉卿、杜甫,学界都曾掀起研究热潮,并将之转化为创作,如田汉的历史剧《关汉卿》和一系列“杜甫”小说。此外,“陶渊明大讨论”“李清照讨论”等学术活动也催生出了《陶渊明写〈挽歌〉》《李清照》等小说作品。

① 洪子诚:《从〈花集〉到〈古今集〉:被迫“纯文学”》,《文艺争鸣》2016年第5期。

② 郜元宝:《文学史叙述:陈寅恪式与鲁迅式》,朱文斌、庄伟杰主编:《语言与文化研究》(第5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6年,第13页。

而《柳宗元被贬》《广陵散》《风送滕王阁》《赠剑记》等一系列小说也以柳宗元、嵇康、王勃、辛弃疾等古代文人为主人公。戏剧方面，丁西林的《孟丽君》，师陀的《伐竹记》《西门豹》《列御寇》相比同时期的历史剧而言，都表现出更明显的学术品格。散文方面，学者们推出了一些文人小品，如刘知渐的《杨慎与黄峨》，缪钺的《杜牧与张祜》都由研究申发而出。这些“古典性”的文学文本既与现代题材创作泾渭分明，又与同时期“古为今用”口号下的一般历史题材写作有所不同，值得关注与再解读。

第三，对古典文学资源的应用与诠释，与当代文学秩序的建立密切相关。“十七年”时期，古代文学学科几乎参与到历次学术运动中。1952年1月号的《人民文学》突然开辟了“关于晚清诗人黄遵宪”的讨论，由任访秋对半年前王瑶发表的《晚清诗人黄遵宪》一文展开批评。这场前无预兆、后无结果的“讨论”显然和《武训传》批判运动有关。因为任访秋的“质疑文”与王瑶的“答辩文”围绕着两个主要问题展开，关于“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与对太平军、义和团等农民起义军的态度问题，二者都是《武训传》批判中的核心问题。1954年对《红楼梦研究》与“胡适派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与“古典文学”的关系就更加紧密了。游国恩、刘绶松、蔡仪、王瑶、余冠英等学者发表大量文章，围绕胡适的文化态度、文学史观、文学思想和研究方法展开批评。而“胡风批判”运动中，胡风有关“民族复古主义”的言论，被指为对待文化遗产的“虚无主义态度”，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便从此入手，着力批判。而学科内部的几次热点讨论也都有较为明确的现实意义与所指。1956年关于“李煜词”的讨论，指向了是否有超阶级性情感存在的问题；《琵琶记》大讨论中关于人伦情感的探讨，本身就打破了“人性”“人情”的禁区；1958年开始的“陶渊明讨论”“李清照讨论”，都是针对“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斗争公式”讨论做出的反拨……古代文学研究重心、方式方法的变革，反映出当代文学的一些特点。同时，对于古代“经典”的研究改编与观众反馈间的落差，也反映了当代文学接受制度的特点。

以古典文学为切入口，对文学场域内不同文学资源关系的考察

近年来，学界在文学生产领域不断深耕，文学谱系外的跨学科研究成果较为丰硕，但也出现了重外部研究，与文学审美特质渐行渐远的问题，而从文学内部着手，或许是一种较为有效的研究路径。在文学知识谱系内的跨学科研究，以往对苏联文学资源关注较多。实际上，古典文学资源对当代文学有时并非直接施予影响，在文学场域内将其与其他文学资源作类比研究，可以更好地反映出不同文学力量间复杂的关系。同时，依托“古典”视角，也可将这种跨学科考察扩展到更大的文化场域中去。

第一，围绕古典文学资源与五四新文学资源关系的考察。“十七年”时期诗歌发展方向论争的核心问题，就围绕着古典资源与五四新诗资源而展开。“十七年”时期，五四新诗一直处于被贬抑的状态。1950年林庚在《新诗的“建行”问题》中提出以五七言作为诗歌形式基础，后又提出所谓九言诗的“五四体”，^①指明在古典诗歌传统上建立中国新诗，此观点被众多学者肯定及发扬。1956年，朱偰提出用“诗词歌赋”的传统形式表达社会主义文化，得到朱光潜的支持，也再次引发古典诗歌传统与五四新诗传统的激烈论争。及至新民歌大量涌现，雁翼、沙里金、红百灵、李亚群、沙鸥、何其芳、卞之琳等人在《星星》《处女地》《诗刊》《萌芽》等刊物围绕诗歌形式问题展开讨论，将这场古典与现代之争推向高潮。

① 林庚：《九言诗的“五四体”》，《光明日报》1950年7月12日。



① 何其芳：《关于现代格律诗》，《何其芳全集》第4集，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96页。

② 何其芳：《关于新诗的“百花齐放”问题》，《处女地》1958年7月号。

③ 参见卞之琳《哼唱型节奏（吟调）和说话型节奏（诵调）》《对于新诗发展问题的几点看法》等论文。

④ 艾青：《诗的形式问题——反对诗的形式主义倾向》，《人民文学》1954年3月号。

⑤ 郭沫若：《谈诗歌问题》，彭放编：《郭沫若谈创作》，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65—66页。

在论争中，何其芳、卞之琳、艾青、郭沫若、冯至等现代诗人站出来维护了五四新诗传统，尽管他们中不少人此一时期正在从事古典文学研究工作，甚至在进行“古为今用”的创作。何其芳提出建设“现代格律诗”的主张，否定以五七言句法作为诗歌形式基础的提法，认为这种句法和今天的口语有很大矛盾，“势必把我们的诗歌的车子倒开到五四运动以前去”；^①坚持主张多样化的民族形式，认为新诗并非只能师法古典诗歌与民间诗歌，也可以适当继承五四以来的传统并吸收外国诗歌的影响。^②卞之琳对传统哼唱型节奏与五四说话型节奏进行了区分，肯定了受外国诗直接影响的五四新诗早已成为一种传统，今天不能只恢复哼唱（古典）的传统，而排斥朗诵（现代）的传统。^③艾青也指出近十年来在民间歌谣与古典诗歌传统影响之下，的确产生了一些优秀的“格律诗”，但同时也产生了许多押韵的概念诗和标语口号，反对将五七言作为唯一的民族形式，认为“复古的倾向和爱国主义毫无关系”。^④郭沫若则正面肯定了“新诗是起过摧枯拉朽的作用的”，五四新诗打破了已经僵硬了的旧诗传统，“对于中国的诗歌起到了起死回生的作用”。^⑤对于“十七年”时期中国新诗的考察，古典文学视角的引入显然是不可或缺的。

第二，围绕古典文学资源与苏联文学资源关系的考察。苏联文学是新中国文艺建设的权威话语，相比之下，古典文学则缺乏进入中心的力量。在向苏联文学趋近的过程中，古典文学试图摆脱五四新文学力量的压制，并在重新形塑后，进入理论本土化的构建环节。这一过程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到“两结合”的理论转型中，体现得尤为深刻。古典文学之所以能够参与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讨论中，源自刘大杰对于苏联“现实主义保卫战”中艾尔斯布克等人观点的引用，并通过对中国古典文学“现实主义”溯源的方式参与其中，获得了当时苏联学界的积极回应，直接隶属于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保卫“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一支，同时也打破了1949年后当代文坛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的垄断。1950年代末，随着我国外交上与苏联关系的冷淡，文化上也开始调整对苏联文学的态度，为了建设具有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古典文论一度受到重视，掀起了短暂的研究热潮。而“两结合”创作方法也作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本土化阶段的产物应运而生。当文艺实践需要摆脱苏联文学影响时，古典文学所代表的本土性便脱颖而出。为了证实“两结合”的经典性与可行性，周扬在报告中认可了古典文学中已经有“两结合”的存在，因而古典文学学者广泛参与到研究中来。

古典文学以自己的方式参与到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到“两结合”的理论建设中，但是在对理论的追逐中却很大程度消解了自身的独特价值。前期研究借势于苏联“现实主义保卫战”，然而这场对于“世界文学”霸权的争夺战恰恰是要回避、淡化与古典现实主义的联系。在对待“古典”的态度上，苏联文学和五四新文学可以说是一致的。在后期研究中，“东风压倒西风”的激进革命话语被转化为一场中国文学保卫战，古典文学再次参与其中，进行了一次“寻根”之旅。只是这场摆脱苏联影响的文学保卫战，其政治意义仍是指向现代的，“古典”在其中似乎无关痛痒。这也造成了古典文学尽管自始至终参与其中，却需要不断弥合其间的话语裂缝。当它向苏联文学趋近时，造成了文化之“根”的丢失，而其本土化的研究又始终不被新文学者所认可，这或许可以解释茅盾在1950年代后期的种种反常之态，例如在《夜读偶记》中“粗暴”地用“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斗争”公式去概括古代文学史特征，坚决否认古典文学中存在着“两结合”现象，屡屡质疑古典文学进入研究的合法性，其中所表达出的恐怕仍是新文学者的某种“傲慢”与“偏见”。以往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研究已经注意到古典文学在其中的参与，却忽视了它的作用，实际上以其为参照系的考察，或许更能反映出文学场内部的复杂关系。

第三,以古典文学为参照系,在文化场的交叉地带考察“十七年”文学生产的特点。1960年代,在“古为今用”口号下,历史剧创作兴起。和以往几次历史剧高峰相似的是,这些创作总伴随着“文学真实”与“历史真实”的激烈论争;不同的是,以往的论争都在文学界内部进行,而1960年代的“历史剧”是文学界与史学界合力的产物,它是两个学科在古今隐喻关系上的文化实践。这次论争的起点源自1959年史学界推动的“为曹操翻案”运动,郭沫若率先发表了《谈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一文,由古典文学作品《胡笳十八拍》的作者考证引向“历史上的曹操”,继而提出曹操是“民族英雄”的观点,号召史学界“为曹操翻案”。要想还原“历史上的曹操”,就必须推翻“文学曹操”的形象,由此引发了史学界与文学界的争鸣,也开启了1960年代有关“文学真实”与“历史真实”的论争。回顾这场“翻案”,史学界与文学界除了争鸣外,也有合流。作为史学家的郭沫若以历史剧《蔡文姬》的写作推出曹操讨论。原本《蔡文姬》只是一部虚构作品,但为了导向“历史真实”的史学讨论,而强化了剧作背后的“真实性”。在这种力求“真实”心态的影响下,郭沫若在古典文学界展开了对《胡笳十八拍》作者的考证,郭沫若执拗地为蔡琰及其作品正名。

除了郭沫若本人在文学界与史学界的双重“翻案”活动外,其他史学家也很自然地参与到这场跨界“翻案”中。1960年11月中国戏剧家协会召开历史剧座谈会,在座的历史学家们跃跃欲试,甚至把历史剧的教育意义看得比历史教科书还大。史学界很快编撰了《历史剧拟目》一书,供文学界参考。而史学家吴晗更是“破门而出”,写作《海瑞罢官》,随后又不厌其烦地进行着“故事剧”与“历史剧”的甄别。表面上看,1960年代历史剧之争围绕“文学真实”与“历史真实”难以厘清的关系纷争不断;而实际上,文学界对于“真实性”的争夺,史学界利用文学性来重塑历史,二者互相牵制、互为因果。古典文学与史学早在“为曹操翻案”运动中就体现出某种困境:一方面,史学家们必须打破《三国演义》、“曹操戏”中的“文学曹操”幻象,才能还原历史上真实的曹操形象;另一方面,史学界对于古典文学界的“同情”,使得批判又陷入了一种矛盾状态。作为学科合力的历史剧创作,就是在矛盾与同情中达成一致的产物,历史剧比“历史真实”与“文学真实”都更直达本质,它在学科的交叉地带、在上层“象征建构”与底层“文化实践”的龃龉间生长,真实地反映着不同文化场域间的复杂关系。在更大的文化场域内,当个体的逻辑、规则受到挑战,它们如何协调、抗争,如何在权力的分配与争夺中重新定位,生成新的关系网络,这些都可以在古典文学、史学与当代文艺创作的交叉领域中展开。

文学生产研究中的“古典”视角与“当代文学史科学”的建设

“十七年”文学生产研究的“古典”转向,与当下学界的研究趋势也是相应和的。随着学科建设的成熟,当代文学研究出现史料学转向。1980年代初史学界就提出了“回到乾嘉去”的口号,在这股考据热潮下,现代文学界很快作出响应。1985年,马良春率先提出建立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的建议。在1996年召开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第七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上,解志熙提出在工作中有意加强一点史学的品格、理性的节制、客观的精神和传统的学术规范,也就是说“古典化”一点,有助于学科的成熟。^①2004年召开的中国现代文学的文献问题座谈会上,刘增杰提出在现代意识的烛照下,发掘出史料本身所渗透着的现实生活的脉动,“建立现代文学的史料学”。^②在实际的研究工作中,现代文学的史料学研究更是早已开展。

① 解志熙:《“古典化”与“平常心”——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若干断想》,《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7年第1期。

② 刘增杰:《建立现代文学的史料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4年第3期。



① 程光炜：《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下沉期”》，《当代作家评论》2019年第5期。

② 李强：《“史料”何以成为“方法”——论中国当代文学史料研究》，《文艺争鸣》2019年第10期。

③ 如吴秀明的《一场迟到了的“学术再发动”——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的意义、特点与问题》，马天娇、金宏宇的《“史料学转向”：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新发动”》等文对于“当代文学史料学”的确立具有命名与阶段性小结的意味。

④ 姚晓雷：《重视“史”，但更要寻找“诗”——也谈当下文学研究中过度强调史料建设作用的迷津》，《学术月刊》2017年第10期。

随着当代文学史进入“下沉期”，原先的评论对象变成了研究对象，位置下沉到了能够做历史研究的状态，^①建立当代文学“史料学”的要求也被提上日程。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的爆发被指为有意策划、发动的结果。^②1991年，张颐武率先提出建立“当代中国文学史料学”的设想。而在实际的学术研究中，洪子诚、吴秀明、程光炜、黄发有、张福贵、张均、金宏宇、王秀涛等学者也已经将这种设想落在实处。在观念与方法“以古为师”的转向中，金宏宇的版本谱系研究，张均的“本事”研究，李遇春的新文学家旧体诗词研究，都取得较为丰硕的成果。“当代文学史料学”被称为学术的“再发动”“新发动”，^③史料研究的学术会议频繁召开，学术期刊上发表的相关文章也日益增多。

“史料学”转向是当代文学研究发展的必然结果。当代文学研究虽受西方“后”学影响明显，但追根溯源，仍与古典文学一脉相承。学科的划分有助于学问精进，但不意味着学科的封闭，学术的专门化是建立在相关学科通识基础之上的。治当代文学而与古典文学隔绝，无法做到博通，从长远来看，必然难以深刻。对文学史料的重视，是学术传统的回归，古典文献学中有关目录、版本、校勘、辑佚、辨伪等一系列学问，既是治学的入门之径，也是科研工作不可或缺的部分，更是宝贵的精神财富。对于现代专家型学者而言，史料学的建立更有助于学术整体观的塑造与艺术敏感性的培养，是当代文学70年来学科自觉的必然结果，是进入“下沉期”的当代学术研究回眸古典、上征借鉴的重要表现。扎实的史料研究，可以避免“以论带史”“以论代史”，真正做到“论从史出”“史论结合”。因而，古典文学传统在当下的意义，不仅仅是学术方法的回归，也是学术品格、学术精神的传承。可以说，“史料学”转向为当代文学生产研究的“向内转”做出了必要的准备。

古典文学对“十七年”文学生产的介入，是以一种动态的方式贯穿其中的，它既体现为当代作家在身份与心态上的自觉转向，并转化为创作；也表现为古代文学学科在当代试图进入文化建设中心的努力。古典文学在当代重新形塑的过程，切实地反映着当代文学生产的大关节，因而针对这种“古典”转向的研究就不仅是题材、体裁问题，它涉及文学作品及价值的生产、流通、消费等方方面面。以古典文学作为文学生产研究“向内转”的探索路径，不是普通地向传统回溯，而是一种文化自信与理论自信，试图用中国文学方法去解决当代文学问题。从文学研究现状来看，对古典文学资源的关注、学习、借鉴，对于学术视野与思维方式的开拓都大有裨益。

文学的本质是诗性的审美想象，而不是史性的事实描述，要建立重视“史”，更要寻找“诗”的研究。^④除了新史料的发掘，外部研究的拓展，“向内转”的研究或许可以为我们提供更多的思路。以往“十七年”文学研究重制度、机制研究，强调文学生产过程中的权力关系，而忽视对于文学谱系内部的研究，似乎跨学科研究只能在学科大类间进行。实际上，从古典文学视角切入就会发现，在文学知识谱系内部寻找新的突破点更接近文学本质，在相关学科的互涉与对话中可以保持对于文学生产关键性问题的追踪。正如陈翔鹤等作家的古典文学研究及其当代小说写作所表现的那样，“古典”与“当代”本身就互为阐释依据，通过对文本暗码系统的发掘，将展现出更为复杂的文学现场。借助古典文学，“十七年”时期的作家在其所处的文学制度与话语环境中具有了一定的超越性；而今天借助古典文学视角，我们的研究也将获得一种超越性，在知识谱系的交叉地带，在新的空间结构与关系结构中进行文学意义的考察。而这种向着文学谱系内部深入的研究模式又可以不断推衍、复制到当代其他时段的文学研究中去，将当代文学制度层面的研究与主体精神内面的洞察结合起来，创造出扎实而又“美丽的”文学研究。

编辑 屠毅力